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

——从政府和市场的统分视角批判新自由主义

钱伟刚

内容提要: 资源配置方式是经济理论的基础内容,对理解中国道路变迁有积极的启发价值。从完成三大改造、实行对外开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始终在“政府和市场”的统分结合过程中探索适宜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可以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制度三个层面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加把握好新时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资源配置视角来看,应该要准确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关系、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关系、内生演化与外部规制的关系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源配置 政府 市场

中图分类号: F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8)03-0001-11

## 一、引言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这点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主线,即资源配置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尝试,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取得了卓著成绩,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始终积极妥善地把握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经济史表明,在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下,社会经济模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代世界既有前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又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既有美国“自由放任”式经济,也有日本国家主导式经济,它们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都采取典型的“政府+市场”联合方式。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飞速发展,199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仅为2%,但是到了2017年,占比已经增长到15%左右,中国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就的原因解释不一,或是从宏观调控层面进行思索,认为是财政、货币、收入等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或是从微观管制方面深入分析,认为是企业创新激活了中国经济动力;或是从中观协调视角着手探讨,认为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速了经济发展等。无论哪种视角,实质上在总体上都集中表现在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关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诸多困境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全

作者简介: 钱伟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当代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编号:18NDJC169YB);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专项课题资助。

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节点临近。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引起广泛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盲目崇拜市场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两种观点归根结底都属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思考,且表现为机械对立。本文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政府+市场”的联合始终存在,任何企图用政府或市场的单一配置资源方式诠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想法都不符合实情。

## 二、中国道路的探索主线:政府和市场统分视角下的资源配置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 2013)。可以从1956年、1978年和1992年三个节点划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阶段,其中,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并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1966年)时期;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经验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中国道路的变迁深刻反映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并引起了广泛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场等,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切实加强国家规划的导向作用和统筹兼顾,通过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来逐步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胡钧、韩东 2010)。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是政府主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权力和市场的作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高建 2011)。还有人强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同时强化国家宏观管理,不可只迷信计划或只迷信市场(王诚、李鑫 2014)。显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政府+市场”联合调节经济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对此,我们不妨分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阶段进行梳理,佐以证明。

### (一) 1949~1956年:政府和市场交替为主的过渡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整个国民经济还带有旧中国经济结构残留的痕迹,当时的国民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五种,尽管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商业、大工业被收为国家所有,但私营经济成分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资料显示,1949年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工业占63.3%”(魏礼群 2008)。如何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具体分为两步走:第一,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国营经济领导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通过发挥不同经济成分的作用有效地弥合了长期战争留下的创伤,国民经济得以顺利恢复。第二,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时期。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分两个步骤,首先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其实质是要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先后发布,农业合作化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的改造也以合作社为主要途径,到1956年底接近92%的全国手工业从业者参加合作组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较为复杂的政策,主要可总结为“利用、限制、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原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几乎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在10年

定息结束后,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综上所述,在1952年前,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受到鼓励,政府的作用在加强;而从1953年开始,市场的作用在不断减弱,政府逐步取得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根据国情和总路线不断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并为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

### (二) 1956~1978年: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全面计划经济

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进入十年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计划方式配置资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1956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明确提出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还有一部分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的商品生产还不能消灭,相反要大大发展,这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

从国民经济结构来看,1975年,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81.1%和18.9%;社会商品零售中个体所有制占比为0.2%,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比为99.8%(宗寒,1996)。1978年,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比分别为77.6%和22.4%。可以看到,在1966~1978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建设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

### (三) 1978~1992年: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调整适应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心,打破计划命令配置资源,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视角来看,1978~1992年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市场调节机制的试验过渡期,价值规律再次受到客观重视。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由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sup>①</sup>“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1978~1992年是我国探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调整适应期。这段时间经济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1978年,我国国民总收入为3678.7亿元,1992年为27208.2亿元,增长6.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增长到2334元。1978年我国产业结构为“二一三”型,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近1.7倍和2倍;1992年产业结构为“二

<sup>①</sup> 这里需要做出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中,从原来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变成了“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第二个解释是中央文件对资源配置方式选择提出的理论背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曾经就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划种类进行分析,提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种,其中行政协调又可以分为直接管理(IA)和间接管理(IB);市场协调可以分为自由协调(IIA)和有控制的协调(IIB)。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药方”,即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该方案对我国后续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三—”型,第二产业增加值是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近2倍和1.2倍,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显然,正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产生了积极效应。

#### (四) 1992~2013年:突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基础性作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发展。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影响范围,在原有的资源配置基础上增加了结构调整。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明,“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则要求“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显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边界持续扩大,并已经进入公共产品和国家重要经济命脉。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胡锦涛,2007),这次的提法是个重大调整,不仅将市场的作用上升为制度层面,并将其视作为宏观调控的内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胡锦涛,2012),两个“更”表明了党中央在资源配置方式选择上对市场的进一步认可。

1992~2013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不平凡时期,期间经历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共中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利用各种要素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继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2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从“二三一”型转变为“三二一”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万元。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基础性作用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同时也需要看到,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政府的作用,市场的基础性之所以能够产生有效成就,还得益于国家积极的宏观调控。

#### (五) 2013年~至今:政府和市场作用双提升的新时代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既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又明确了未来资源配置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我们进入政府和市场作用双提升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2017)。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还必须要充分围绕“市场经济”做文章,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习近平,2013)。当然,我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更好”是让政府从具体性和一般性事务中脱离出来,集中精力做好政府应该接管的事情,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否定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指示,“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习近平,2016),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习近平,2017)。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的探索始终是围绕着由政府还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微观经济与中观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的关系等。因此,从资源配置方式探讨中国道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资源配置方式的动态调整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过程。

### 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

世界经济史表明,国家在追求国民财富增长路径上必须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的具体水平来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方式。当代中国道路先后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为主的不同发展时期,尽管在具体方式上有所侧重,但“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始终存在,并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才能准确理解。

#### (一)“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2013),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反映了我国道路价值取向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价值取向可进一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前者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后者则强调了特殊性和个别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发展生产力不是别的什么生产力,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因此既要充分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生产力潜力,也要充分激发政府配置资源的生产力潜力,这是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期的客观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共产主义原理》在回答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说:“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09a)。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市场经济是在初级阶段提升生产力的必要之举,也是与资本主义并行竞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选择,在这其中政府和市场的的作用各司其职,必要的时候需要有所调整。以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例,几乎所有国家在资源配置上都是采取“政府+市场”的联合形式。毫无疑问,参与国际分工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要遵循和利用全球化中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等一般规律,不断提升我国生产力的水平和层次,同时更要强调生产力的保护,这在全球化中体现为国家利益。因此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这样的现象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比比皆是<sup>①</sup>。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这部分内容具体包括六个组成,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它们既反映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深刻揭示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这些战略安排必须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同配合,不可偏废其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习近平,2018)。

#### (二)“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

<sup>①</sup> 以中国光伏产业在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为例,2012年9月6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涉及金额超200亿美元;2013年6月4日,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分阶段征收11.8%和47.6%的税;201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终裁,对中国相关企业最高征收165%的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光伏产品根据国内生产成本核算并不应该被认定为倾销。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国际贸易中市场配置资源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平 2014)“坚决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 2016)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并不存在纯粹政府或纯粹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政府+市场”的配置联合是社会经济治理的常态手段,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

国家治理包括经济与非经济两大部分。从经济方面来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产品的提供。根据所有权不同,产品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纯公共物品。当进入商品经济阶段后,用于交换的私人产品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供需结构发生变化,在交换范围较为狭窄的阶段,供需信息并不复杂,社会计划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市场平衡。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商品生产及流通突破地域和时间约束,国际贸易、期货交易形式更加复杂,市场机制下的竞价拍卖和供需调整成为引导私人物品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目前部分准公共品被纳入到市场体系中,而纯公共品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经济史实也可以证明,政府与市场联合配置资源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通过兵舰贸易实现顺差,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最大化、政府最小化成为经济决策的主要原则,大萧条后积极主张“政府+市场”配置资源的凯恩斯主义铸造了资本主义战后黄金二十年,而在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崛起,但国家干预经济却从来不曾消失过,尤其是在信用货币基础上,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实际上变得更加容易了。一批欧洲学者提出的改革理论,比如布鲁斯的分权经济模式、科尔奈的有控制的市场协调、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等,都是“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的再现。

从非经济方面来看,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不断解决好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近些年来,有不少市场者认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放宽市场在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等,然而事实表明,在事关百姓安居乐业的民生领域,市场化的效率往往是比较低的,必须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 2017)我们的国家治理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的,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要看到市场的激励效应,更要看到政府的保障效应。

### (三)“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的边界依经济成长阶段动态调整

“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必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两者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在哪里?回答这一问题既要明确对资源进行具体操作的主体,又要权衡把握它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从操作主体来看,政府和市场都是围绕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来配置资源,往往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引导和调控,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充当了这个中介角色。从涉及空间来看,政府介入的往往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市场在普通商品和一般性竞争领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动态调整。

企业作为中介集中表现为所有制结构,通常来看,公有制企业反映政府对资源的配置,非公企业代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既体现在量上,又体现在控制力上;当前,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非公有制经济在量上超过公有制经济,表明政府配置资源的力度在下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在上升。必须指出,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是有最低比例要求的<sup>①</sup>,否则这将直接对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产生影响,如此下去,“市场经济”作为阶段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就会游离于“社会主义”,更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市场配置资源影响面较宽,影响程度较深,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决定的阶段性现象。

根据以上论述,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出发点,同时生产力水平又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从中国道路实践来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通过发展解决诸多问题是行之有效的,关键是要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它们有各自优势——市场

<sup>①</sup> 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几乎探底,中国的国有化程度仅有33%,远低于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卢森堡(54%)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沙特(47%)、阿联酋(42%)、印度(36%)等发展中国家(详见程富富、董宇坤 2015)。

有利于激发活力,政府有利于保证公平,“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提供了重要支撑。另外,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是根据中国经济成长阶段而动态调整的,哪个作用强一点,哪个作用弱一点,主要根据不同时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有所侧重。

#### 四、我国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是两回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的领域如国防建设,就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做”(习近平,2014),这为我们理解我国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毋庸置疑,市场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对市场不能过度崇拜,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解析市场的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积极功能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各种不足。当前,国内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不断摒弃政府作用,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决定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窠臼,这种判断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的。为了清晰说明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我们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深入解析市场决定论,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市场决定论与《决定》精神相悖甚远。

##### (一) 从运行机制来看

市场决定论的微观剖析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经济运行机制是指各种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和作用的关系,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受经济规律制约和支配。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容主要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影响,在当前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经济运行机制按照生产关系主要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类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飞速提升,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市场作用机制的结果,由此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全发挥市场的作用。从逻辑和作用范围上来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这并不等同于市场在经济运行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避而不谈市场的弊端和政府微观监管,刻意放大市场的作用,历史经验和实践都表明这是行不通的。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它主要依靠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机制维持经济运转,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三对主要矛盾:一是资本家内部矛盾,即瓜分剩余价值的博弈和冲突<sup>①</sup>;二是雇佣劳动内部矛盾,即受剥削者也有不同的阶层划分;三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在不同的行业、产业和部门中分配,马克思深刻披露了资本的逐利本性,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2004a)。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必然带来自发性的弊端,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自觉性<sup>②</sup>能够弥补自发性的不足,同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下的国家核算、时间调节、按比例发展等也都是降低市场风险的必要手段。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在微观层面上片面追求市场化,其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激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而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我扬弃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对市场逐渐放宽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包括运用收入调节等激励措施提升劳动生产率、强化责任制意识,实现利润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有

<sup>①</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集中等,在资本家内部表现为大鱼吃小鱼,企业收购、兼并、入股联合等现象都是资本集中的表现。

<sup>②</sup>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阶段划分时,根据分工状态分为自然性、自发性和自觉性三种,其中资本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自发性分工,共产主义则是自觉性分工。由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自觉性分工的成熟程度自然就相对不足,因此在弥补自发性分工不足的效力上并不必然十分显著。

统一,积极发挥政府微观监管功能,弥补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弊端。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对中国改革已有成就的原因分析是片面的,其主张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 (二) 从管理体制来看

市场决定论的中观剖析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经济管理体制是指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涵上包括经济运行机制。除此之外,所有制形式及其具体经营形式、经济管理方式、经济管理权力和利益分配等都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内容。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析既可以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等方面着手,也可以从生产和流通等环节进行切入。

市场与经济管理体制直接相关的是管理手段,间接表现在所有制形式及经营上。经济管理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在经济手段上,市场是国家组织经济建设的一种工具,它不仅无法代替行政和法律手段,还要受法律约束。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主张国退民进,企图实现完全私有化,这不仅否认国有经济的功能,更是对所有制经营形式的单一认知,他们不愿意承认在市场内在动力下生产方式会发生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谈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曾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 2004b),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上,股份制作为一种具体经营形式,会对生产方式产生自我否定而走向新的生产形式,即纯粹市场化的所有制经济发展不是永恒的。另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呆板地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经营形式上缺乏激励,实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营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sup>①</sup>。

经济管理权力的划分主要体现在中央、地方和部门上,本质上反映权力的归属和配置,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根本目的是要打破国家在合理程度上的集权,在地方获得分权后进一步肢解,以市场为核心必然致使资本的权力日益膨胀,由经济管理权限所决定的利益分配也就理所当然出现不公<sup>②</sup>。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企业、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出现许多新矛盾并时而激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功能被夸大,而市场的负面效应被忽视。市场为资本提供了肆意游走的空间,也就使掌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向权力寻租、俘获政治利得更加便利。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要求管理体制去政府化,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宣称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都尚且不可能实现,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行得通呢?必须清醒认识到,去政府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违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 (三) 从社会经济制度来看

市场决定论的宏观剖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上。经济制度是社会在某发展阶段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经法律确认并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是区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反映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要借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才能准确划分。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在一个社会中会同时存在多种生产关系,只有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才能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制度。

<sup>①</sup> 比如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分析,普通家庭农户承包土地后,可以进行土地流转,有条件的农户再进行租赁,这种经营形式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收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近些年一直强调简政放权,这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变化而采取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正确的决策。简政放权不是自我否定,它有明确的职能边界,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要谨防其职能受市场决定论误解和扭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表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一点不容置疑。由于笃信市场作用不仅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还要求在经济基础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要以市场为标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本质上是想实现经济制度去社会主义化。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改变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因此该理论否定公有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这只是理论空想,因为像美国、日本、德国等不同经济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国有经济,只不过是占主导地位、影响力有限而已。

市场决定论认为公有制总体上效率不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由此进一步指出只有实现市场主导化,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经济效率提升的保障并不是市场单方面的,而是“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另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即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经历新生、幼稚、成熟、灭亡等阶段,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其初期表现出来的生产力并不一定高于其他社会形态成熟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由此积极吸取其他社会形态在生产力水平上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成为必要。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缘由便是如此,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自我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基于微观和中观的片面之见,强制性地要求在宏观制度上实现资本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相悖的。

## 五、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四个关键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2015)。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经济改革急需在全球树立自己的话语体系,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路探索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对此理论界从诸多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这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部分学者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还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结果,等等。本文认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动态调整是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线索,避开这一点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魂”,即便学说形成系统,也会在历史与逻辑上无法实现有机统一。从资源配置视域来看,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应该从四个方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 (一) 政府和市场不是严格的对立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2015),这说明政府和市场并不是严格的对立关系。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有各自的分工和作用范围,但是在市场发挥作用的某些领域,政府也完全可以做得好,政府发挥职能的某些行业也并非市场不可为。不少学者将政府和市场相对立是出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比如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业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有损人民利益的产业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等;市场反映出资本的逐利性,私人资本往往不会介入没有利润的产业市场,其生产提供由政府完成。这些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要求,然而从资源配置的技术可操作性层次来讲,两者是可以有交融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过的,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用。另外要注意,尽管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在反复强调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纠正和帮助,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纯粹的互补关系。

### (二) 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并行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变动明显,再加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

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09b),很多人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视为严格的对立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能够且将长期并存,这是被中国经济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这种并存既包括纯公有经济与纯私有经济的对立,又包括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都能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非公经济以利润为驱动,能够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公有制经济不仅强调利润,而且重视公正并同时兼具政治功能,这些都是非公经济不可能有的属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范围是清晰的,它们的职能决定了各自存在的空间和持续时间,然而主张国退民进的人忽视这点,过分强调非公经济进入影响国民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和产业,这对经济制度势必产生不可逆转的结果。总而言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非严格对立,但有相对清晰的边界。

### (三) 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存在非一致性关系

总量效应是指国家经济规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的动力和潜在的增长空间;结构效应是指国家资源在不同的行业、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配比而产生的经济刺激效力。改革开放初期市场配置资源之所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作用,正是得益于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存在高度相关:首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产业结构较为初级,部门结构所拥有的资源不合理,允许市场方式作为计划方式的辅助,使供需、竞争和价格成为无形之手,自动纠正不合理结构,从而释放了大量被闲置荒废和错乱配置的资源,提高经济增长动力;其次,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较低,经济增长空间较大,内在机理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增长效应十分显著。过去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铸就了市场经济的辉煌,而在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十分庞大,更多的问题表现在结构性上,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党中央作出判断,我国目前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存在非一致性。必须看到,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力有所减弱,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需要得到更好发挥。

### (四) 内生演化与外部规制的互相牵制关系

根据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和内因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对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没有内在动力,外部规制就会丧失基础。当前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而做出的正确决策;完全强调市场作用而忽视政府作用不仅不符合辩证法要求,也违背客观事实,没有无外部规制保障的内生演化,也不存在无内生演化基础的外部规制,它们互相牵制,所以市场决定论只强调内生演化而忽视外部规制,并非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政府+市场”联合配置资源依然是我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之举。

### 参考文献:

高建,2011:“‘中国模式’的争论与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3:83。

胡锦涛,200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胡钧、韩东,2010:“‘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13—21。

王诚、李鑫,20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济研究》2014,6:160。

魏礼群,200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13:“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3/1108/c1001 - 23471419. 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8/c1001-23471419.html)。

- 2014: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民日报》2014-05-28。
- 2015: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http://cpc.people.com.cn/n/2015/1124/c64094-27850965.html>。
- 2016: “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7/04/c\\_1119162333.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7/04/c_1119162333.htm)。
-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8: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02-01。
-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4: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德]卡尔·马克思,2004a:《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4b:《资本论(第三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iticism of Neo-liber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Government and Market

Qian Weiga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is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economic theory which helps understand the changes along the Chinese path. Completing the three great transformation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deepening economic reforms, China has always explored for an appropriate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It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the boundary i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is new era, we should research the market's function based on economic mechanisms,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 much better. It's quite important to comprehend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public economy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aggregate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endogenous evolution and external regula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 Allocation; Government; Market

(责任编辑:王燕燕)